

生产力攻坚阶段需要新思路

人力部前天发布的《2014年工资报告》带来了一些好消息，但也再次凸显生产力仍然低迷不振的问题。面对商业成本的日益提高，以及今后五年经济增长预期的调低，我们实有必要对生产力课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并拿出更有效的提振策略。

尽管过去的一年里世界经济情况低迷，包括中国在内的增长引擎也出现了缓慢的迹象，但我国工人的工资仍取得可观的实际增长。去年的通胀率从前年的2.4%下降至1%，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工资增幅因此达到3.9%，高于2013年的2.9%。

令人鼓舞的是，一般低薪工人（也即每月基本薪金1000元以下）的工资增长显著。去年获得固定工资加薪的低薪员工，平均基本工资涨幅达14.2%，高于其他普通员工的8.4%。这显示，全国工资理事会自2012年起建议雇主给低薪工人最低的加薪金额的做法，已取得一定的成效。

因此，每月基本工资不到1000元的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正在逐年下降，2012年为9.8%，去年则为6.8%。也因此，工资会上月底公布今年7月至明年6月的工资指导原则时，也把固定加薪的工资上限从1000元调高到1100元，建议加薪额则是最少60元。

当然，低薪工人基本工资能有如此显著的提高，也得力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持续紧张，这是政府收紧外劳政策的结果。新任人力部长林瑞生日前才表示，这一2010年开始实施的政策不会有所逆转，意味着接下来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还会持续，这对于低薪工友基本工资的持续提升有利。

但是，这不等于说工人因此就可以乐观地预期今后几年都能继续获得可观的实际工资增长。反之，从主要数据来看，前景的挑战性相当大。首先，是鉴于世界经济境况不佳，政府前阵子已把我

社论

2015年6月6日

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预期调低至每年2%至4%。2010年经济战略委员会发表的报告，预估未来10年里，我国每年可取得3%至5%的经济增长。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高达曼上个月在全国职工总会的常年劳动节晚宴上说：“这意味每年平均大约3%的经济增长将是我国经济的新常态。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这其实是良好的增长，比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还要高。”

除此之外，工资增长的前景也面对总体生产力欲振乏力的极大挑战。上述报告指出，2014年总体劳动生产力萎缩了0.8%，是我国经济自2010年摆脱金融危机后最差的表现。2004年至去年，我们每年只取得0.7%生产力提升，而在这十年里工资的实际年均增幅则达到1.9%，也就是说这样的工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因此，政府才出台了未

来技能培训（SkillsFuture）计划。

对工人而言，工资提升最终必然取决于技能的提升，否则，长此以往，先是企业利润将受影响，继而不胜负荷而关闭，或不得不迁往其他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但在提高生产力的努力方面，我们似乎至今仍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整体生产力数字尤其令人丧气。提高生产力的努力可说已来到关键性的攻坚阶段，也需要新的思路。

对于一个成熟经济体而言，也许我们必须更务实地看待生产力课题。与其笼而统之，不如分而治之。毕竟每个经济部门或行业都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情况，不可能取得一致性的生产力提升。基于此，政府在4月间提出要在所有关键行业成立劳资政委员会，为各个行业量身打造具针对性的人力发展计划的做法，是更可能取得实际成效的方案。希望此举能进一步发挥我国劳资政三方密切合作的优势和潜力，攻克不同行业提升生产力的瓶颈。

漫步

孟孟

体育精神

新加坡正如如火如荼庆祝独立50周年，加上东南亚运动会隆重举行，这当儿更值得新加坡人彰显发扬“体育精神”，也就是团队精神。团队精神正是新加坡50年建国成就的推动力。

在建国过程中，有两个外交纠纷最能说明团队精神对新加坡的重要性。一是，我国与马来西亚之间针对白礁主权的争执；二是，我国西部和东北部的填海工程上的新、马外交较劲。

近日，担任过律政、内政和外交部长以及国务资政的退休政坛元老贾古玛教授，推出新书“Be at the table or on the menu”（《不为座上客即为盘中餐》，华文本尚未出版），书名寓意深刻，让人联想起成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小国不气争，不团结就会沦为别人菜单上的美食或是砧板上的鱼肉，这是国际政治不争的规律。

贾古玛的新书，随即让我回忆起新马之间的纷争，新加坡如何以团队精神化解危机，维护主权利益。书中有不少精彩的描述。

在白礁主权和填海课题的国际仲裁事件上，新加坡团队自始至终抱着乐观态度，发挥集体协作精神，犹记得当年跟踪和处理新闻时，一直都处在且惊且喜、心情起伏的状态中，因为任何事情无论如何有把握，不到结局，难免有变数。

贾古玛新书中对这两个事件的谈判过程，透露了几个“有趣”的情节，既让读者感受到当时政府一方面士气高昂，一方面对事情可能出现变数而忐忑不安。

马来西亚在白礁（Pedra Branca）问题上跟新加坡纠缠了30年，其来有自，一是由于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作祟，一是新马关系时好时坏。一个国家多年拥有或是管理了某块地方，而在别人提出争执之下，主动提交国际仲裁庭解决，在国际上尚未有先例。当年新加坡主动把白礁课题提到国际仲裁庭的做法，贾古玛在书中形容为非常不寻常（unusual）。他的朋友，一个国际著名的国际法专家当时对他说：“你们几十年来一直拥有这个岛，为何还要冒险把纠纷送上国际仲裁庭，没有人可以保证庭上15位专家会怎么判决。”

马来西亚在这个所谓的“主权纠纷”上并没有损失，新加坡被逼诉诸国际仲裁，事实上是正中他们下怀。

尽管在国际法上，新加坡占有优势，当时的诉辩团队仍不敢轻敌，而是全力以赴。在去海牙国际仲裁庭之前，新加坡团队做了充分准备，为陈词作彩排，由旁人提出批评，甚至在最高法庭上，在两位法官面前演练一番。

在海牙仲裁庭的庭审期间，马方突出奇招，呈上一

张白礁的图片，显示这个岛非常靠近柔佛海岸。新加坡团队马上指示新加坡海事局到同个地点同个角度拍照，隔天随即呈上多张照片，暴露马国的照片，是运用镜头歪曲背景所见的山的高度，制造白礁与柔佛海岸的距离，比实际距离更短的印象。贾古玛形容，当时在庭上的马方一名高级代表（一位女士），在看到新加坡呈现的照片时“在座位上畏缩着，双手掩面”。

在2003年，马来西亚单方面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宪章（UNCLOS）下的条文，把新加坡在大士和德光岛的填海工程，提上了国际海洋法仲裁庭（ITLOS），要逼新加坡马上停止填海工程，指责工程阻碍了船只航行，造成环境破坏，影响马国渔夫生计等等。当年贾古玛并没有领导抗辩团队，但他特地从纽约飞到德国汉堡出席聆讯，为新加坡团队打气。他静悄悄地进入法庭坐在最后一排，仲裁庭主席却当庭宣布他的出席，并欢迎他的到来。当时马方对于他的“抢镜头”，据贾古玛形容“看来很不爽”。

马方呈上了一些照片显示，新加坡填海工程如何靠近一艘游轮，以支持他们的论点。就在当天听讯结束后，贾古玛、许通美和新加坡团队由仲裁庭走回酒店途中，看到埃尔比河海峡（Elbi River Channel）上有一艘大游轮，团队灵机一动，即刻拍下照片，然后由团队中一位跟汉堡港口官员有良好关系的海事专家，取得这个海峡的宽度与深度数据，然后又通知新加坡海事局漏夜到填海地带，等待同样的一艘游轮经过时拍下照片。第二天，新加坡团队向仲裁庭提呈了照片，以证明比埃尔比河海峡宽得多、深得多的新加坡海域，大游轮能够通行无阻。

填海纠纷课题，双方并没有进入最后的仲裁而达成和解，其中原因如何，贾古玛只说这是由于许通美以及新加坡官员跟马方官员关系良好。我的解读是，新加坡团队在国际仲裁庭上所表现出的高度专业和协作精神，是马方中途放弃缠斗的真正原因。

马国对白礁主权国际仲裁结果的坦然接受，给新加坡留下深刻印象。去年，在新马两国交换土地的发展费争执上，国际仲裁作出对马方有利的判决，李显龙总理也即刻发表文告，表示毫无保留地接受，这是礼尚往来。新马两国亲密如斯，有问题能够私下解决最好，不能解决由第三方主持公道，彼此尊重判决，为国际社会立下了模范。

然而，区域国家在南中国海以及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岛屿主权纠纷，都似乎对新马和平解决纠纷的“体育精神”视而不见。最近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完全没有人提及，无疑是一大遗憾。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我孩童时代的假期生活



我孩子的假期生活



早报漫画 吴嘉禾

回应 黄循财部长观点模糊不清

针对部长2015年6月5日刊登在早报言论版的指责，阿裕尼一后港一榜鹅东市镇理事会（AHPETC）感到很意外。我们在此做出以下澄清，以正视听。

高等法庭最近所审理和所需要决定的主要是法律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发展部要求法庭委任独立会计师执行以下两项事务：

第一，在动用2014/15和2015/16财政年度政府所提供的津贴时，共同签署支票。这笔总计1400万元的津贴，目前被国家发展部扣住不发放；

第二，翻查市镇会的旧账。

高等法庭接受AHPETC律师的抗辩，认为国家发展部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而驳回国家发展部所有的有关申请。

高等法庭并没有审判，或者对有关市镇会财务疏失的问题，在法庭进行事实的求证。高等法庭所表达的有关意见，基本上是根据总审计长的报告。国会已经用了两天的时间，专门辩论总审计长的报告。所有负责监督市镇会的管理的工人党议员，包括党秘书长刘程强在内，都参与了有关的辩论，并针对有关的问题加以解释和澄清。

林瑞莲否认有关她在国会撒谎的指控。国会

有国会特委会，确保议员的行为恰当。

市镇会没有把钱从运作基金的户头转账到累积基金户头，并不等于钱不见掉。到2013/14财政年度为止，市镇会已经把钱转入累积基金户头的钱，全数转账到累积基金户头。

如今，国家发展部扣住了1400万元的拨款不发放给AHPETC。如果国家发展部继续不发放政府所应该提供给每个市镇理事会的津贴给AHPETC，市镇会在接下来就无法依期把钱存入累积基金户头，因为钱被国家发展部扣住了。

AHPETC不明白黄部长根据什么事实，指责AHPETC或工人党“滥用资金”和有“不诚实的行为”。

每一个财政年度，市镇会都必须接受审计，审计报告都必须呈给国会，并公诸于世。

市镇会所雇用的承包商是否有提供服务，做好份内的工作，居民有目共睹。

承包合约必须依据市镇会财务条款进行公开招标。任何市镇会的职员如果违法或贪污，也必将面对法律的制裁。

阿裕尼一后港一榜鹅东市镇理事会发言人

缅甸的海洋与“政治左右”

周雷

中国的近海相比，也存在巨大差距。这些国家在近海捕捞、渔村观光、渔村人家生活体验、渔获贩售、海港物流、旅游附属设施修建、涉海观光型建筑和历史建筑、海洋文化馆建造等方面，都有太多经验和教训值得缅甸学习。

缅甸在欠发达的基础上，已经存在严重的污染、城市拥堵、社会贫困、族群冲突等问题，在缅甸有许多自然风光意义上高质量的海滩农村和渔村，几乎看不到任何环保设施，大量廉价的工业和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垃圾堆积在海滩，城市污水四处乱淌。

我向觉温提出，缅甸虽然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海洋优势，尤其是绝佳的地理位置，它的海洋路径通过印度洋、孟加拉湾、安达曼海、马六甲海峡、泰国湾，基本上形成了对整个南洋和东盟（亚细安）国家的辐射力。与印度、老挝、泰国接壤，与印尼海岛大陆架彼此勾连，具有强大的区域优势。但是在现实政治中，缅甸似乎仍然是一个山地型和土地束缚型政权（land-locked and earthbound），而非一个海洋政权（seaward）；而这似乎也是中国也要面临的问题——如何从河流文明转变为海洋文明。

觉温认为，首先缅甸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存在微妙关联。在1948年以前，缅甸提起中国都要抬头仰望的，缅甸当时的知识

分子对中国的思想和政治变动十分感兴趣。相反在改革开放之后，缅甸知识界的兴趣降低了。就他个人的独立观感，中国的反对左派过于迅速，因而造成不可控，它产生了对环境的破坏。

因此，谈到中缅两国都面临的政治议程和发展命题，其实也存在一个左和右的问题。在解决社会矛盾、民族独立、经济发展方面，究竟是用“左派”的方式，还是“右派”的方式？在觉温看来，缅甸的左派痕迹是相当根深蒂固的，即使是那些反对左派的团体，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运动方式也是左派式的，他们很少讲调和，而是讲阶级斗争。

在中缅关系方面，1988年以前，中缅关系都非常好。1988年之后，缅甸政府实际上和本国人民的关系破裂了，在“近政远民”和“近民远政”的路线上，中国继续选择前者，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与民间和在野派互动有限，因而必然造成现实中中缅互动中“代军政府受”或者受缅甸民意“根压及鸟”的影响。

例如在中缅油气管道事情上，觉温同意的判断。它事实上出现了一个海洋经济通道的模型，中东、非洲、印度洋、孟加拉湾、安达曼海都联系起来，在“四国六方”的合作框架中，它形成一个现实的海洋型经济操作案例。缅甸当然可以从这个项目获得好处，但是民间不这么看，甚

至缅甸政府也不愿意这么看。缅甸政府一直没有完整信任中国，而是始终保持警惕——缅甸共产党曾经是最大的反政府武装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所以，无论是发展方略、国际关系、民间互动，缅甸都想搞平衡。但是缅甸民间有喝政府倒彩的习惯，同时遵循“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一原则。觉温认为，美国在缅甸受到欢迎，很多时候是因为美国和缅甸政府多年不合，经常可以收拾缅甸政府，反而受到缅甸民众的欢迎。

在和西方的关系上，缅甸政府和人民其实都亲西方，不同之处在于，缅甸政府还是想走东西方平衡的路线，但是民间想一边倒，彻底倒向西方，现在的民主体系也都是西方的。虽然缅甸上世纪70年代是左派的黄金时代，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不了解左派思想，也对中国新近的左派和右派斗争，尤其是新左派的主张几乎是不了解的。

当我追问觉温，为什么讨论缅甸问题要研究左派，左派思想在缅甸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缅甸存在长期的左派基础，昂山将军也是左派的，这种思想已经渗透民间和日常生活中。例如最近因为教育法出台，引发学生示威和政府武力冲突，它都是左派思想的具体实现。缅甸的学生运动和88世代学生组织从来是不谈判的，就是要消灭对方或把自己弄到牢狱里

为止。而在另一个民间环境运动中，也就是莱比塘铜矿项目中，据他所知，真正的幕后推动者就是一群老左派。

在访谈尾声，觉温让我进入他的书房，我看到他的阅读书单，包括阿玛蒂亚森《好辩的印度人》《理性和自由》、阿尔·戈尔《未来》、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詹姆斯·罗宾森《国家为何失败》、本特勒《网络财富》、迈克尔·波特《国家的竞争优势》、戴尔蒙《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脉》、乔纳森·海特《正义之心》、乔姆斯基、格林斯潘等一大批西文和缅文书籍。

觉温说，之前他曾参加过反抗政府的武装，在山里躲了五年，现在基本上写写文章，同时进行翻译。最近他还翻译了赵紫阳的经济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文章。

“虽然我是左派，但是我认为邓小平的政策，事实上对缅甸和中缅关系更有好处，这一点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被人感受到”。觉温在许多缅甸学者一样，在缅甸语中夹杂许多英文单词。

在缅甸，不论渔村的农民、仰光街头的摊贩、大学里的知识分子、热闹街头的商舖，翁山将军和翁山淑枝的政治选举头像随处可见。他们的图像时常出现在家庭的客厅中央，与佛陀并列，甚至被仰光卖报纸的小贩用刺青刻在自己的身体上。这些有关政治图像的使用和观点表达，都是缅甸在左右之间摇晃的民间身影。

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